

新華時事叢刊

帝國主義怎樣利用 宗教侵略中國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時事叢刊
第 92 種

帝國主義
宗

主義志樣利用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1124

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宗教侵略中國

編輯兼：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者：（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轎士路）

1—20,000

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初版

定價（甲1）4,300元

目錄

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宗教侵略中國	謝興堯
附：近世（一八五六——一九〇〇年）教案表	
洋教士的罪行	榮孟源
惡教士霸產罪行	榮孟源
西開教案——帝國主義利用宗教迫害中國人民的罪證	頌甲
一八五八年以前美籍傳教士在中國的侵略活動	余繩武
一個偽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李提摩太	丁則良
從穆德的一生行跡中看美國如何利用宗教進行侵略	徐盈
從司徒雷登看美帝文化侵略	雷潔瓊
某些天主教的敗類是怎樣破壞人民革命事業的	朱波谷
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團體侵華的實例	王匡
不能容許美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	『人民日報』社論
附錄	
獻縣天主堂間諜案	克
石家莊市破獲「公教報團匪」案經過	公

天津市破獲「公教報國團」及「民衆建國協進會」案經過

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美國間諜卜相賢等經過

廣東興梅專區破獲梅縣美國教會間諜案經過

八

九

九

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宗教侵略中國

謝興堯

一、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作爲侵略工具的開端

天主教自明朝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即已輸入中國，但當時並未得到發展。到清朝初葉和中葉，滿清政府爲防止教會在中國的非法活動，不許西洋人在中國傳教。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因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在砲口底威嚇之下訂立了『南京條約』，於是大批帝國主義的爪牙——外國教士，紛紛來華，他們認爲這是一個『轉機』，『好像一朝重視天日』（見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在一八四四年，美國脅迫滿清政府成立『中美望廈條約』，其中首先規定美國人可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醫院、教堂。接着法國又強迫滿清政府在『黃浦條約』中承認對法國教堂要加以保護。及至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在英法聯軍之役中，『中法天津條約』成立，又規定『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從此帝國主義在中國傳教，得到了條約上的保障，各地方的教會便很快恢復，於是侵略者的棋子遂滿布於我國各地。帝國主義者就是這樣地用大砲把傳教士送到了中國。這些外國教會經過一百多年的禁止（清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之後，又來了這一個所謂『轉機』，他們便趾高氣揚，製造所謂『給還舊址交涉』。『南京條約』訂立後，滿清政府被迫

承認，「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爲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屋，如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至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之後，又強迫訂立「天津續約」，更擴大了「發還舊址」的範圍，規定凡「前奉天主教者之天主堂、學堂、墳塋、田地、房廊等件，應賠還交該處奉教之人」（續約第六款），這就引起了我國人民與外國教士的爭執。

自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以後，「還堂交涉」是當時最繁雜最嚴重的問題，原因是外國教士們藉口『發還舊址命令』作種種無理要求。如『各省地方，抵還教堂，不管是否有礙民情，硬要給還。並有強指紳士華麗房屋爲昔年教堂，逼令民間退讓之事，甚至將有礙體面之地，及公所會館廟宇，爲闖地紳民所最尊崇者，均任意索取抵給教堂。即或實係當年教堂經教中人賣出，嗣後民間轉相售賣，已非一主，並有從新修理費用甚鉅者，教士不出價值，逼令交還。又因房屋偶有傾倒，反索修理之費。各種舉動，百姓均怒目相視，儼若仇敵。』（見總理衙門給各國『議辦傳教章程』以下簡稱『傳教章程』）這是滿清賣國政府說的，實際還不止此。我們若翻閱一下當時有關還堂的文獻，如『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各國照會目錄』，及李鴻章、劉蓉等的奏議，其中關於還堂的文獻文件，還多得很。時間則僅由一八五六一至一八六八年，區域則遍於南北各地，而這些交涉，均係帝國主義傳教士依據侵略條約及滿清政府所頒布的『給還舊址』命令提出要求的。

『南京條約』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始，外國教士在中國大肆活動也是從此開始的。

二、外國教士擅入內地及干涉中國內政的暴行

帝國主義既利用教會爲侵略中國的據點，有些外國教士遂以政治條約爲背景，以金錢爲工具，侵害中國主權，欺壓中國人民。

第一是西洋教士擅入內地。『南京條約』及『中美望廈條約』雖然規定外人只能在通商口岸居住，不得入中國內地傳教通商。而帝國主義者則常故意違約，擅自潛入內地。他們因被各省地方官查拏而引起的交涉，由一八四六至一八五〇年五年之間即發生三十五件之多（『籌辦夷務始末』道光，以下簡稱『籌末』）。發生的地方有：西藏、四川、湖北、浙江、廣東、河北、山西、江蘇等地。在這短時期內，外國教士們到處潛入我內地和邊區。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美國教士丁禮良來到中國，他明知道『按條約，終不許入內地』傳教，但是他悍然地說：『吾人奉主命傳教萬方，即有世俗阻止，安能阻哉』（丁禮良：『花甲憶記』）。當時由於滿清政府腐朽無能，對於西洋教士、外國使臣的蠻橫要挾，根本無法應付，不敢阻止。

第二是教士們以『中國通』的資格，作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謀主。每次簽訂不平等條約，他們大都參與其事，陰謀策劃。大家都知道『南京條約』是中國第一次帶上帝國主義的枷鎖，馬利遜牧師是基督教徒來中國的第一人，但是這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的起草人，便是這位新教徒馬利遜牧師。而中文草稿又出自名教士郭實那（*Row Grealat*）之手，中國方面只在字句上略加修飾。這個條約便由這兩位教士包辦。馬利遜在一八四三年七月十六日寫信給他的妻子，很自得地說：『我要告訴你，我的名義是中文秘書兼譯員，年薪一千三百鎊，我應當穿副領事的制服，上有皇家的鈕釦』（見『馬利遜小傳』）。一八四四年美國派遣顧興（*Caleb Cushing*）來中國強迫滿清政府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協助顧興訂約的主要人員，便是美國最早來中國的基督教士裨治文和伯駕兩牧師，他們替帝國主義弄得了五口通商權，治外法權，傳教權和置買地產權。裨治文牧師

在他家信中說：『我等在中國傳教之人，與其說是由於宗教之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之原因』。這是他的坦白招供。而伯駕牧師也曾親自回到華盛頓，向美國參眾議員做侵略中國的報告（廣學會出版：『梁發』）。他竟因侵華有功，於一八五五年九月便正式就任駐華使節，負起侵華的總責。一八六〇年滿清政府與法國增訂條約（即『中法北京和約』）時，有法教士隨法使爲翻譯，於中文中竟私自添入『准法國宣教師在各省租買用地，建造自便』（陳捷：『義和團運動史』以下簡稱『運動史』）一句，昏聩的滿清政府，竟簽字承認。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美國利用機會強迫滿清政府簽訂『中美天津條約』，久住中國的丁韞良和威廉士兩牧師，即隨美公使利衛廉（William Reed）到天津，參加起草條約的工作。在當時雙方對於傳教條文的爭執中，美方堅持不讓，他二人也參與其謀。後來丁韞良說：『奉教傳道一節，係先出於美約、英約仿照也』（『花甲憶記』）。這就是說美帝國主義利用傳教士爲它開闢了侵略中國的道路，同時英法等國也是照着這個圖樣加以翻版。及至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爆發，各帝國主義組織八國聯軍前來鎮壓，丁韞良又上條陳於北京公使團，他主張由各國共同管理滿清政府。在清末又有以宗教家、教育家的身份成爲中國政界要人的李提摩太，他在中國辦過報——『時報』，辦過學校——『山西大學』，他自稱是中國的朋友。但他主張『中國印度化』，又提議中國政府內閣部長可以用外國人（見他的自傳『西鐸』）。以上這些人都是西洋教士中所謂『待人如己』，『爲上帝服務的』。總觀過去凡中國政治上、外交上每一重要階段，均有傳教士參與其間，不只是作幕後活動，並且還作台上主角。

第三是這些帝國主義傳教士還普遍地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如『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法國天主教移行四川省官員，鑄用關防開用。同治七年貴州主教胡縛理擅送照會一件，保舉前道員多文等，請予優獎。山東傳教士有擅稱巡撫之事。四川、貴州教士並有因教案致請撤地方官之說。是不

但侵官吏之權，甚且侵國家之權，種種無理情事，焉得不激成衆怒」（『傳教章程』）。以一個教士的身份，而要『鑄用關防』，『自稱巡撫』，並且還要『保舉道員』，『撤換地方官』，這都說明這些帝國主義傳教士是充滿了統治慾望的。

第四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教堂和教士的其他不法行爲和特務活動。如庇護貪官（『籌末』同治『駐藏大臣恩麟奏黃鑑投法教士爲護符』摺），隱匿盜首（『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一八八四年後中法戰事發生以前，廣西的法國教堂公然勾引匪徒大肆其特務活動（一月二十三日廣西巡撫徐延旭奏『教堂勾匪滋事摺』），後來浙江定海又風聞教堂內有『伏奸藏砲』的事（薛福成：『浙東籌防錄』卷二）。可見這些教堂和其中的一部分教士實與帝國主義的侵略相表裏，在內地作特務工作。還有一些教士欺壓善良。據滿清政府所指爲典型的，如『同治八年四月嚴斃教士李國一案，實因教民逼人退婚而起，已將平民何彩正法。而教民殺死平民，及歷年詐誣姦擄焚殺風稱首惡之教民王學鼎等，雖經議罪，迄未到案。其糾衆殺斃團民趙永林等二百餘命之司鐸覃輔臣，梅教士聲稱已赴外洋，無從究辦，川民更爲忿恨』（『傳教章程』）。以一個西洋教士竟屠殺中國人民二百餘人之多，末了一走了事，當然要激起中國人民起來堅決進行反抗了。

三、中國人民的反抗和所謂『教案』

中國廣大的人民已經認識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作他侵略的前哨，西洋教士更是侵略者的先鋒，因此各地人民普遍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所辦的教會。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各地青年學生起來舉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一、『籌末』同治七十）。特別四

川人民因憤於教士單輔臣屠殺了二百餘條人命，行動更爲激烈，如余棟臣便是當時的代表人物。滿清賣國政府和外國教會稱他是『開教英雄』（『清季各國照會目錄』法三三二頁以下簡稱『照會目錄』，上海徐家匯天主堂『格致益聞匯報』光緒二十四年三十號）。當時全國各地人民羣衆最普遍的行動，是『燬教堂，殺教士』（見李剛已：『教務紀略』，徐家幹：『教務輯要』等），滿清官書統稱之爲『教案』。最大的一次是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起因是當時法國仁慈堂迷拐男女，埋葬幼孩，引起人民激憤，要求進入教堂檢查。法國領事官豐大業『隨帶跟丁，各持槍刀，同赴通商衙門滋鬧，在商署向該大臣（崇厚）開放洋槍，百姓均爲不平，愈聚愈衆。劉傑趕到向衆民彈壓，適該領事豐大業由商署走出，瞥見劉傑，即對面施放洋槍，劉傑躲避，致將家人高升中傷。衆人忿激，將豐大業羣毆斃命。……教堂四方火起，衆始逐漸解散』（『籌末』同治七七年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語）。這一次反帝鬥爭，純粹是一個羣衆運動，『非特無主使，其何人動手逞兇，及何人首先鳴鑼，亦不能確鑿指出』（同治九年九月十一日刑部奏）。但創子手曾國藩（滿清政府特把他由南京調到天津辦理此案）爲了討好帝國主義，竟把無辜人民『馮癩子等十五名擬以正法，王五等二十一名擬以軍徒』。後來又補添『將劉二等五名正法，鄧老等四名發配』（同治九年十月總理衙門給法國使臣羅淑亞照會）。以上這幾十個人都是因反對帝國主義而被滿清政府殺害的。當時此案引起各方批評：『豐大業以法國使臣，何得遽開洋槍，強賓欺主，一擊不中，又擊其次。是豐大業本有應死之罪，而百姓罪在擅殺罪人，然出於一時忠義奮發，當得稍從末減，……未有國人攻盜，而駢戮國人者也。……乃傳聞該大臣等奏辦情節多有未符，不免於法國曲徇出脫，於津民過涉吹求』（同治九年十月十六日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這還是官方的議論批評，人民的憤怒更是不可遏止的。在全國人民的輿論壓迫下，曾國藩也只好承認：『外慚滿

議，內咎神明」（『曾國藩書札』），而滿清政府終於『殺戮義民以謝敵，又暗爲厚恤（其實毫無『厚恤』可言——作者註）其家』（同治九年閏十月二十三日突議奏），『天津教案』便是如此解決的。滿清賣國政府既屈服於帝國主義底勢力，且不惜殺戮愛國的人民。這正說明一般『教案』的本質，和賣國政府處理『教案』的方法。當時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橫暴，即滿清政府也認爲『現在來中國傳教者，直如一國之中有無數自尊自主之敵國、平民怨毒更深，而百姓至衆，不可盡誅，況衆怒已成，將有不肯俯首就誅之勢』（同治十年給各國『議辦傳教節略』）。『天津教案』之後，當時民間有許多反帝的書籍和連環圖畫向社會宣傳，均被封建統治者禁止（『照會目錄』法三〇三頁，英六一四、六二〇頁）。

『天津教案』是一八七〇年，後來發展爲義和團愛國運動是一九〇〇年，中間雖距三十年之久，但這兩次最大的人民反帝運動，實有密切的因果關係。當『天津教案』被鎮壓後，滿清統治階級也知道『教中之氣餒愈張，吾民之怨憤愈積，禍患正不知所止』（同治十年七月突訴等奏）。後來論史者也認識此點，說『是役也（按指『天津教案』）法重情輕，論者寬之。而天津附近地方見聞較切者，尤憤激焉，此又義和團所以興起之大原因也』（『運動史』）。因爲當時『天津教案』給人民深刻的刺激，反帝及反對外國教士的情緒，更不可遏止。在這三十年發展過程中，又繼續不斷的發生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教案』，直到最後發展爲義和團起義。這次起義是純粹農民的愛國主義運動。前此只是反對帝國主義傳教士，這次則喊出『滅洋』的口號，從前只是在各地零星發展，這次並到達封建統治的王都北京城，從前沒有信仰組織，這次則帶着封建時代農民固有的宗教色彩。

義和團的愛國運動，是以『殺洋人、滅賊官』爲號召的，當時人們均稱之爲『義民』，在反倭

略鬥爭中，曾表現了偉大勇敢的精神。即滿清政府也說『我義民以血肉之軀，與槍砲相薄，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誓齡童子亦執干戈以衛社稷』（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上諭）。天津方面的聯軍統帥英國海軍提督西摩爾說『義和團所用若爲西式槍砲，則所率聯軍必全軍覆沒』（『運動史』）。帝國主義的『洋兵』在廊房、楊村間攻擊義和團，並在北京屠殺起義羣衆，共約四萬人（李扶：『拳禍記』）。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義和團戰敗，訂立『辛丑和約』，當時只大量賠款（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而未割地者，即因各帝國主義怵於義和團的死戰，故集中於經濟上的壓榨，避免形式上的刺激（辛丑正月廣學會出版：『萬國公報』）。從此滿清政府一變仇外而爲媚外，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更加緊侵略，教會勢力也更爲普遍深入。披著文化與慈善事業外衣的教會學校、醫院等，到處林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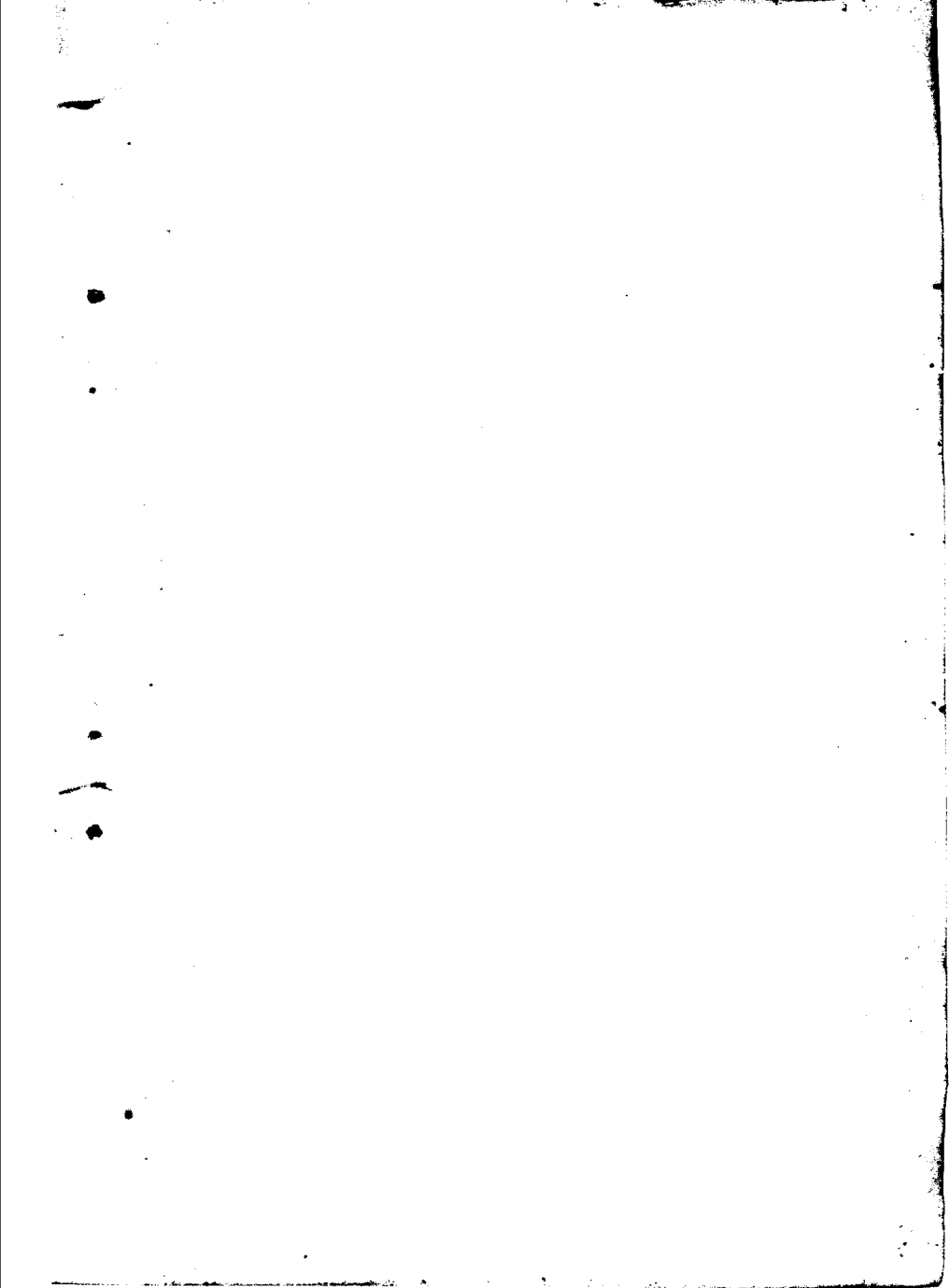
四、結 語

我們看天主教、基督教教會在中國發展的過程，始終是沿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軌道，在近百年史上，教會是侵略者的前站，侵略者又是教會的背景，中國一有對外交涉事件，即有若干外國的宗教家摻雜其間，作重要的幕後活動。如前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在中國僞裝宗教家、教育家多少年，表面上作出非常同情中國的樣子，實際上他是美國侵略中國一個最重要的特務，是集過去的伯駕、丁韞良、李提摩太等之大成。後來索性揭開假面具露出他的本來面目，作美國駐華大使，執行侵略中國的任務。又最近在天津逮捕的三個美國間諜卜相賢等，他們也均是外國教士，還曾作過『院長』、『神父』、及大學『副校長』等。然而他們在中國所作的事，是堅決地反對中國人民，

甘願作帝國主義的特務。這都是帝國主義與教士關係的典型例證，值得我們警惕的。

所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規定得很明確，就是：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第五條），但是純粹的宗教信仰，應當絕對與外國侵略活動以及反革命活動相分離而不應當與它們混合起來。關於這一點，凡是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愛國人士，在今天都有此覺悟。現在全國各地的天主教、基督教教徒所舉行的自覺的愛國運動，是絕大多數人民所歡迎與支持的。

【節自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洋教士的罪行

榮孟源

——讀有關天主堂的史料的筆記

最近重新讀了一些教堂的出版物和一些有關外人傳教的記載，看到所謂『教案』，在近代史上，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漢朝佛教，唐朝摩尼教、景教，宋朝猶太教，元朝也里可溫教等傳入中國，都不曾引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對，為什麼從英法聯軍侵略中國以來，中國人民反對洋教士的鬥爭，即所謂『教案』，年年發生，處處發生呢？推究其原因，正如列寧所說：『那些到了中國只是爲了賺錢的人，那些利用其被讚頌的文明只是爲了欺騙、掠奪、暴行的人，那些對中國作戰只是爲了獲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權的人，那些偽善地以傳佈基督教來掩護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能不憎惡他們嗎？』歸根結底，『教案』底實質，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洋地主、洋惡霸、洋強盜壓榨的鬥爭。

德國『探險家維斯曼烏夫之徒，稱揚布教事業，於領得殖民地有大功』（『清朝全史』八十一章）。天主堂所出版的『中國歸化』（獻縣孟神父著）一書中公然說：『在法京巴黎府，有人想立個會，幫助中國歸化。』美國最早到中國來的教士裨治文在家信中更說得坦白，他說：『我等在中國傳教之人，與其說是由於宗教之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之原因。』（廣學會出版：『梁發』）從這些材料中我們不難明白，帝國主義派遣教士到中國來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

洋教士既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遣隊，所以在帝國主義壓迫中華民族的不平等條約裏邊，不只寫着它們在中國有傳教權（『中美望厦條約』等），而且寫着，這些來到中國的『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中法天津條約』、中美、中英、中俄等『天津條約』）。一八六一年法國公使將二百八十張『傳教諭單』送到滿清政府，強迫頒行全國，並『面稱傳教士皆係『端方』之人，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增訂教案彙編』卷一）。一八九九年滿清政府又迎合帝國主義的意旨擬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規定總主教或主教品位與總督（管理一省或幾省）巡撫（一省長官）相同，大司鐸及司鐸（神父）品位與司道、府、廳、州、縣各官相同，各官員接待教士，『按照品秩，以禮相答』。並規定地方官所接見的教士『均應泰西人充當』，中國神父僅是『幫同傳譯』，並沒有權力（『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七）。由此可知帝國主義派遣到中國來的教士，並非『傳教之人』，而是帝國主義派來統治中國人民的官員。他要我們中國人民聽從其統治，『如尊敬地方官長一樣』（上海慈母堂出版：『正教奉傳』）。

這一些壓榨中國人民的洋惡棍，由各帝國主義駐華公使指揮，在中國各地建立教堂亦即建立帝國主義的政權。首先洋教士破壞中國主權，說什麼教民控告不信教的平民，要『稟明主教或本處大司鐸與地方官『秉公』查辦』；平民控告教民於官府，『官府行文於主教或司鐸，亦必『秉公』查辦』（一九〇一年『北京主教樊國梁告示』）。洋教士和中國地方官有同樣的司法權，而洋教士却是帝國主義的代表，不受中國政府任何拘束。中國人民如控告教士，須到帝國主義的領事館或公使館去控告，教士橫行如遭受中國人民反抗，就由帝國主義的領事或公使出面，向中國政府交涉。洋教士『有出門而以槍隊護從者，有在本堂私設公案者，有以種種苛薄之法凌辱中國官吏者，有以少報多濫索債款者』（一九〇四年『外交報』十七號『論永弭教案之政策』），重慶法國主教甚至擅